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总主编：陈 琪 陈 波

战后德国经济与



社会结构变化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Econom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Postwar Germany

王 涌◎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总主编：陈 琪 陈 波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战后德国经济与



社会结构变化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Econom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Postwar Germany

王 涌◎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德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化研究 / 王涌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6.10
ISBN 978-7-5192-1980-2

I. ①战… II. ①王…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德国
②社会发展—研究—德国 IV. ①F151.6②D7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5561号

战后德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化研究

策划编辑 江冉婷

责任编辑 黄琼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8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92-1980-2/D · 014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学术委员会

- 陈 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陈 波（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陈 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肖欢容（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孙学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庞 珣（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周方银（广东外贸外语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白云真（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政治系）
池志培（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刘建伟（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总序

2014年伊始,世界政治就被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纠纷所困扰,亦显示出变化的曙光。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围绕克里米亚的角力,隐隐然让世人看到传统冷战思维的回潮;另一方面,包围在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的疑团,凸显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与困难度。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公认价值的今天,很多老问题尚待解决,不少新问题也应运而生。面对略显纷乱嘈杂的现实,古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治理的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更加明显。在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环境保护、疾病预防以及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要将全球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来解决问题,政治学者需要及时提出有效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其次,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既要对外面对国家间冲突、政经纠纷等问题,也要对内面对因应贫富差距拉大、扁平化社会所带来的诸多矛盾。这些理论及操作层面的疑问,都亟需学者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给出相应的答案。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对正走在“圆梦之路”上的中国自身的突出贡献。其一,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内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深水区”,学者需要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其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伴随而来的外面环境压力也在逐渐增强。如何妥善解决包括海洋争端和贸易摩擦在内的国际议题,如何为已经秉承了近三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注入新的内涵,是理论界必须承担的责任。其三,中国怎样更好地履行负责任大国的职责,并更好地向全世界传达属于自己的政策主张乃至价值取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前瞻性课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术界自身发展的诉求。政治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则是一个肇始于19世纪末,

繁荣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新局面。学者们目前的工作，不仅是要积极追赶和呼应西方政治学科的发展前沿，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也要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治理的丰富养分，扎根于目前的政治现实，缔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适用价值的理论观点。对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国内学界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运用研究资料等方面，也存在着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压力。在目前国际关系学科内范式融合和全球治理理念盛行的背景下，国内学者需要在思想创新和议题选择上做出更多努力。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壮大，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学者个人或者群体的努力，更需要有蓬勃向上的国力和理性有序的社会氛围作为支撑，需要来自于政府、高校、非政府组织乃至公司企业的资源倾斜。与此同时，学者也有责任将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成果，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视角和国际视野，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即所谓智库的作用。目前，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尚属方兴未艾，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同仁加入其中，群策群力间实现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一同积极面对现实，踏实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的目的与意义，为了向国内外学者与公众展示和分享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精心策划和推出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我们期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收集和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等，展现本学科学者们笃学省思的风采。在此，也拜求学界各同道先进，不吝赐稿，共襄盛举。

最后，该丛书的顺利出版有赖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大力支持，有赖有关部门的关心与指导，有赖学界同仁们的关注与帮助，更有赖广大读者、学人的阅评和指教。本人在此一并致上诚挚的谢意！

陈 琪 陈 波

2014 年 3 月 28 日

（陈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科学》执行主编；陈波，“冲突管理、和平经济与和平科学”常设国际学术会议中方主席，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共同主编）

目 录

导 言	001
-----	-----

上篇：经济发展变化

第一章 两德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及其成败	007
一、西德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007
二、东德的中央计划经济道路	011
三、成败分析	015
第二章 民主德国经济失败原因探析	019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019
二、非经济方面的原因	023
三、外部方面的原因	026
第三章 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中两股势力的抗衡与作用	030
一、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建设期	030
二、以调控为主导的社会建设期	033
三、兼顾失重的发展困难期	037
第四章 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	042
一、20 世纪 50—60 年代经济腾飞中的文化因素	042
二、20 世纪 70—80 年代社会均衡期的文化演替	046
三、统一后德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瓶颈	048

第五章 两德统一后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困境·····	054
一、科尔时期的经济道路·····	054
二、施罗德和默克尔时期的发展困境·····	057
三、当前德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061
第六章 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变化的意义·····	065
一、经济与政治两种不同方式的同步·····	065
二、德国经济模式的建立·····	068
三、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果·····	071
四、最新出现的变化·····	076
 下篇：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变化 	
第七章 民主德国社会发展的几个问题研究·····	083
一、社会结构变化·····	083
二、社会的平等与不平等·····	085
三、人口外流问题·····	087
四、统一后东部地区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	090
第八章 战后联邦德国阶级（阶层）构成的变化·····	095
一、社会阶层的构成·····	096
二、历史变化——三个结构图·····	101
三、变化背后潜伏的事实·····	107
第九章 战后德国社会变化的三个层面·····	111
一、就 业·····	111
二、人 口·····	121
三、教 育·····	130
第十章 战后德国中层社会的形成及其意义·····	142
一、中间阶层的崛起·····	142
二、中层社会的成因·····	144

三、联邦德国社会中层的特点	146
四、社会中层的意义	148
第十一章 战后两个德国社会的现代性维度	152
一、人口状况	152
二、外来移民	154
三、家庭组成	156
第十二章 战后德国社会结构的国际比较	161
一、人口与家庭	161
二、教 育	166
三、就业结构与收入	171
四、社会不平等与社会保障	175
五、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	179
结 语	181

导 言

战后德国在现代世界史，尤其是在当代国别研究中，是一个极其重要却没有获得充分关注的研究领域。“重要”不仅因为德国是欧洲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更是因为战后的德国的发展，从经济、社会、文化等角度，向世界展示出了西方现代化发展中一个异常成功又独具特色的案例；“研究不充分”是因为迄今的国别研究以及现代化研究关注的大多是英语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而同样成功的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至少在中国是如此。以至我们眼中的西方、我们眼中的现代化，具有着大致相同的面容。当论及德国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时，也大多是从西方国家的一些共有特点出发进行阐述，以至这些国家特有的方面或西方现代化的国别特点遗失在视野外。这不仅使我们的现代世界史研究显得空泛和单一，使我们的国别研究残缺不全，也使我们的现代化认知变得单一和片面。因此，战后德国毋庸置疑是一个有待开发和拓展的研究对象。

然而在国外，战后德国一直是德国研究(German Studies)框架下一个重要的内容，不仅西方学界始终关注着对战后德国的研究，远在东方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也将战后德国视为国别研究或西方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研究的目的与德国本土的类似研究有所不同，它不是在为战后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诊断，而是对之进行了解和把握。而在德国本土，对这方面的研究除了对之进行史学描述和阐释外，还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抑或是适当地给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学术支持。近十几年来，战后德国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的变化尤其受到了研究界的关注。首先在德国本土，后来扩展到国外。此间值得关注的是，在德国本土的这种研究很少以通史的方式出现，大多以专门史的方式进行。如在战后德国经济变化方面的研究中，迄今最受关注的成果有凡尔纳·阿贝尔斯豪塞(Werner Abelshauser)的《1945年以

来德国经济史》（2004年）、普罗利乌斯（Michael von Prollius）的《1945年后德国经济史》（2006年）、斯普利（Reinhard Spreer）的《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2001年）、韦梅尔（Wolfram Weimer）的《从货币改革到欧元》（1998年）等；在有关战后德国社会结构、阶级变化方面的研究中，迄今关注度较高的成果有舍费尔（Berhard Schäfer）的《德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演变》（2007年）、弗洛恩（Franz Josef Floren）的《德国社会演变》（2002年）、盖斯勒（Rainer Geißler）的《德国社会结构变化》（2006年）、哈蒂尔（Stefan Hradil）的《德国社会结构的国际比较》（2006年）等。这些成果不仅清晰展现了战后德国经济、社会结构及阶层的变化脉络及其关联，而且还富有批判精神地指出了其得失及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些研究成果成了国外同类研究主要依循的参考。但它们仍有有待补遗或深入的地方，首先就是要将这三方面（战后德国经济、社会结构及阶层）作为一个交互作用的系统来研究，具体揭示彼此间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影响或左右了各自变化发展的；其次，就是要对各种变化，无论是自发的还是人为的，做出效用评估，以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学术支持。

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呈明显滞后状态，至20世纪80年代才只有一些相关译著问世，如扬绪翻译的《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卡尔·哈达赫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一书，该书只谈到1970年。到了90年代，国内才出现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杨荫恩1995年推出的《战后德国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丁建弘、陆世澄、刘祺宝主编的《战后德国的分裂和统一（1945—1990）》（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这些成果都是通史类著作，对经济、社会结构及阶层变化虽都有触及，但不够全面和系统，尤其对经济、社会结构及阶级这三方面之间的关联涉及不够，诊断性阐述也未充分展开。2000年，吴友法、黄正柏推出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书，开启了中国学界对德国问题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此后丁建弘、邢来顺、郑寅达、朱懋铎、郑春荣、孙炳辉等学者，都推出了不少有关战后德国的研究成果，不少还专门涉及德国社会的变化，如邢来顺的《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桂琪、黎家勇的《德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这些著作开启了中国学者深入研究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尤其对二者的互动关系做了专门披露。但是，其内容主要指向近代德国，对于战后德国则没有充分涉及。辛蕾的《融入欧洲：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虽然专门指向战后德国社会，

但是对社会结构演变还没有深入触及。新世纪以来,国内也令人欣喜地出现了不少关于民主德国的研究成果,如肖辉英、陈德兴的《德国:世纪末的抉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邓红英的《民主德国德国政策的演变(1949—1990)》(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但是,这些成果还不是专门研究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因此,在国内还没有出现专门针对战后德国经济、社会结构及阶层变化问题的系统研究。

本书以战后德国在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方面的发展变化为对象,以专门史方式揭示和把握德国从战后一直到今天在这三方面出现的变化、起因以及其之间的关联。时间跨度上从1945年一直到新千年。经济方面主要关注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不同阶段;社会结构方面主要从就业、教育和人口的角度揭示战后德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进而去把握战后德国社会阶级和阶层方面的演变。最后,将从国际比较(欧盟比较)角度,进一步披露战后德国在社会结构上所处的状态。

研究方法上主要依循国外,尤其是德国本土的专门史和专题研究成果,同时兼顾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基于战后德国这三方面发展变化本身所展现出的情形,将论题分成几个阶段,如西德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重建(尤其是所谓“漫长的五十年代”)开始进入60年代的经济腾飞,进而深入阐述60年代开始的社会变化以及到80年代的众多调整;东德地区则开始于1945—1961年的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启动与动荡期,接着是1961—1987年经济改革与社会主义初步稳定期,最后是1987—1990年的危机时期。1990年后德国便进入了内部面临东西融合,外部面临全球化压力的整合期。在这些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中,德国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上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在纵向上有着种种明显的关联,在横向上也有着许多直接或是间接的关联。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变化虽然有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推动社会走向良性发展。

在操作上,对于两个德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又称为东德、西德)主要根据其具体情况而论之,或是兼而论之。民主德国虽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方面呈现出了一些变化,但在阶层和社会结构方面却不尽然。因此,研究中对于后者则兼而论之。而联邦德国的情形则不同,社会结构和阶层随着经济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采取较详尽的方式对该方面进行论述。至于统一后的德国,本研究中不再对东西部做专门区分,只是在必要时指出一些东西部地区的不同情形,即发展的不平衡。

如此处理，主要是因为统一后的东部地区已经失去了东德时的独立意义，该地区发展所受的制约和影响已经不是主要来自纵向，历史性因素。而是来自横向、来自西德，也就是说，纳入联邦德国的一体化进程主宰了统一后东部地区的发展。

在总体思路上，本研究将兼顾战后德国史与战后德国问题研究的题旨，即力图以史引出问题，又以问题深化史方面的研究；同时，在具体阐述战后德国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发展变化时，重点突出这些领域间的交互作用；此外，阐述中还努力有意识地融入中德跨文化思维，也就是说，关注什么以及如何关注，尽可能融入中国视野，即在当代中国的相关性维度引领下进行选择和思考。这不仅是为了彰显本项研究的中国特色，更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带着德国的影子。



上篇：经济发展变化



战后德国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其国家对经济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国家一直在积极、主动干预经济，经济变化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决定。民主德国的国家干预由于计划经济的缘故暂且不论，联邦德国虽然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但强大的国家干预使得所谓的“德国模式”在20世纪50—60年代经历了黄金期，出现了一个贫富分化相对较小的平等社会。这是战后德国经济发展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

此外，战后德国一分为二的事实，戏剧性地将德国推向了世界政治经济两种不同理念各尽其能、各展千秋的前沿。因此，战后德国经济发展首先应从东西德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来看。但又由于这个具有竞争色彩的不同发展最终以东德消亡为结局，且主宰战后德国经济迄今发展的又是西德经济。所以，本书在比较了东西德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及其成败之后，重点剖析了联邦德国直到今天的经济发展。其间不仅揭示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中两种不同势力的较量以及由此较量而来的发展轨迹，而且也披露了伴随着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文化性因素，由此一方面展现了两德统一后德国经济发展的迟缓，另一方面也展现了由此而来的发展困境。最后，在概括战后德国经济发展总体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这些发展对于社会变化的意义。

第一章 两德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及其成败

欧洲早在 17 世纪启动的工业化旨在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刺激新生产力的释放，以造福人类。这种对个体创造力的单一专注由于不可避免的个体差异而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初，由于对个体创造力和生产率的强势倾斜，这个内含的负面因素在英国和法国基本被忽略。而到了 19 世纪，当这样的社会转型经由英国和法国开始延伸到德国的时候，德国知识界很快出现了要关注此负面因素的呼声。由此，在欧洲社会转型过程中便出现了两种各有权重的经济思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西方社会呈现出相对峙的两种社会形态，而富有戏剧色彩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赢方又分别体现了这两种形态的国家力量，这就史无前例地使战后德国被分成两部分。从同一个民族，同一条经济道路走过来的国家开始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行。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角度，这样的史实将为现代社会理论思考提供无与伦比的史料。一般认为，西德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奉行了市场经济，而东德的失败是由于计划经济，历史的实际情况其实并没有如此简单划一。

一、西德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一般情况下，“社会市场经济”（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被普遍看成西德经济体制的代名词。确实，从战后的西德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德国，其经济体制都是在“社会市场经济”框架下展开的。在华语世界，由于对德语“社会的”（sozial）这个形容词的确切内含无法具体翻译，加上德国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德国经济往往被看成与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甚至日本一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实，德国经济在主导上虽然是依托于市场机制，但并不自由。“社

会的”在德语中是指社会均衡，共同发展。因此，在市场经济道路上，德国走的是一条明显不同于英、美、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在依托市场机制的同时，国家不断进行社会性均衡和调控，甚至不惜牺牲市场机制的活力。可以说，战后西德的经济是在市场与调控的抗衡与交互作用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社会政治也因此相应地分成两大势力：左和右。

二战刚结束时，战胜国本来是想通过“非工业化”政策彻底摧毁德国经济，当时在东西占领区对工业设施的大举拆迁，大有使其从工业国退回到农业国之势。后来，西方战胜国基于德国与欧洲经济此前形成的内在联系，看到德国变弱就无法再出现强大欧洲时，便在1947年8月改变策略，将西德纳入到了振兴欧洲的一揽子计划中。由此，西德的发展又开始回到德国人手中。由于战争导致的生活资料贫乏，人们手中的帝国马克买不到东西，发展经济马上被提到首位。在1948年建立联邦议院之前，便出现了一个由102名成员组成的前议院机构——“法兰克福经济顾问团”

(Frankfurter Wirtschaftsrat)。刚从此前纳粹经济走过来的西德显然不愿重蹈国家垄断的覆辙。前纳粹时期魏玛共和国的自由经济体制虽然能激发生产率，但又会导致自由意志有害社会的恶性膨胀。当时“经济顾问团”的精英们清楚地认识到要振兴经济首先必须清除此前的经济关系，然后制定一套既释放市场活力又使之不游离出国家调控的新经济秩序。于是在1948年6月19—20日进行币制改革：用新币西德马克取代旧币帝国马克。具体措施是：每位居民只能用60帝国马克兑换40西德马克，到8月份可再得到20西德马克。工资、养老金、房租等以1:1的比例进行调换。这样就把价值数千亿帝国马克的证券、储蓄金、银行往来帐、抵押金、债券、股票等一笔勾销。1948年6月24日随即出台了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主导性法律(Leitsatzgesetz)，主要内容有三：①赋予公民自由经营权；②开放价格，取消政府统一定价；③在商品流通领域，只要政府不加干预的，则由市场供需关系去调节。1948年7月开始取消了战后实行的配给制，废除了约90%的价格规定。当时由于生活资料和生产物质短缺，放开价格后，一时价格飞涨。但是，政府并没有人为地去遏制，而是利用市场手段进行调控，比如采取措施将企业的资金状况控制在较低水平，以迫使企业加速将产品推向市场；同时又对加班工资采取零税收政策，以鼓励工人积极加班，多生产。随着生产积极性的激发，价格开始下落，工人的收入开始提高，与此同时由于法国和英国的价格一直在上升，这就使得西德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大幅